

图说人文中国
——
主编 范子烨

天 地 清 风

图说清代

王志强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说人文中国
主编 范子烨

天地 清风

图说清代

王志强 撰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清风:图说清代/王志强撰.—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图说人文中国)

ISBN 978-7-100-15558-8

I.①天… II.①王… III.①文化史—中国—清代—
图集 IV.①K249.0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641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天地清风——图说清代

王志强 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558-8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定价:52.00 元

目

录

导 读 | / 001

制度篇

- 族与国：八旗制度 / 014
康熙皇帝与“御门听政” / 018
军机处与秘密政治 / 022
奏折制度与清朝政治 / 025
密建皇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 029

人物篇

- “皇父摄政王”多尔衮 / 036
“十全老人”、太上皇乾隆 / 040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皇帝与和珅 / 047

政治篇

- 天子巡狩：康熙、乾隆的南巡 / 054
“肄武绥藩”：木兰秋狝 / 058
嗣位？篡位？雍正皇帝继位之谜 / 064

军事篇

- 南京的抵抗与投降 / 070
平定三藩之乱 / 074
平定准噶尔、回部叛乱 / 078
驱廓保藏：两次平定廓尔喀之役 / 086





经济篇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清代的农业 / 094

“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清代的纺织业 / 102

瓷器的黄金时代：清代的制瓷业 / 108

“人间都会最繁华”：清代的苏州城 / 115

社会生活篇

男娶女嫁：清代社会婚姻制度与观念 / 120

“古稀白发会琼筵”：清朝宫廷的四次
千叟宴 / 126

美丽的邪恶之花：鸦片吸食与清代社会 / 131

边疆民族篇

土尔扈特东归 / 138

“金瓶掣签”与西藏政治 / 145

台湾的统一及政治统治 / 152



对外关系篇

贡品抑或礼物：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 158

泛海逐波：蜚声中外的清代外销瓷 / 163

从“万国来朝”到闭关锁国 / 168

文化艺术篇

稽古右文：清廷的编书活动 / 176

流派纷呈的绘画艺术 / 181

不断求变的书法艺术 / 197

异彩纷呈的戏曲艺术 / 203

文言小说的集大成时代 / 208

结 语 | / 213





导

读

明朝末期，历经二百余年的明王朝渐次步入“王朝周期律”的衰亡之期，朱氏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万历初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之下，国家开始出现中兴的气象，然而日渐成年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高傲偏恣日益不满。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万历皇帝谕令褫夺其官爵，籍没家产，开始独掌朝政。摆脱了张居正的辅政，年轻的万历皇帝开始怠政，挥霍内帑，盘剥工商，与民争利，逐步将明帝国带入历史的深渊。故后人有所谓“明之亡，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之论。

与此同时，僻居东北一隅的女真各部在努尔哈赤的统战之下，逐步形成局部统一之势，日渐成为明帝国的巨大忧患。万历十一年（1583），明廷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今辽宁新宾）都指挥使。同年，他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对建州女真各部采用“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战略方针，展开了历时十年的兼并战争，最终统一建州各部。此后二十年间，努尔哈赤展开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并创建了此后成为清朝立国之本的八旗制度，创制了满语，为创建国家做准备。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自立为汗，建元天命。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起兵反明。萨尔浒之战，明军溃不成军，八旗大军势如破竹，相继攻克沈阳、辽阳等地七十余城，明军全线退守。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刚及一月的泰昌皇帝朱常洛突然崩逝（朱常洛崩逝前两天，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服用后病危，酿成所谓“红丸案”）。五天后，皇长子朱由校即皇帝位，是为天启皇帝。在位七年间，年轻的天启皇帝无力国政，专恃于“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朝政渐次落于阉党魏忠贤手中（魏自称“九千九百岁”）。时朝中党派林立，党争迭起的状况愈演愈烈，以政治改革派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展开较量。“乙丑诏狱”“丙寅诏狱”……东林党人最终被排挤出了权力圈。与此同时，国内矛盾不断激化，民变四起，而辽东来自后金的威胁不断加剧，八旗军经常滋扰抢掠边境，绕过山海关长途奔袭北京，并将兵刃转向明朝的藩属朝鲜国，这让明帝国陷入更大的危机当中。

明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病逝，遗诏以信王朱由检即位。面对危机四伏的帝国，崇祯皇帝锐意改革，清除阉党、整顿吏治、重用东林党人……欲力挽狂澜，拯救明王朝。然积弊太重，急于求成的崇祯皇帝不知不觉中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这种无力感导致其屡铸大错，挫败感时时困扰着他。与此同时，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民变此起彼伏，不数年间便席卷大明王朝境内；北部蒙古与后金或以姻亲联合，或以“复仇”为共同的政治口号，不断出兵滋扰明朝北部边境，明王朝陷入巨大的内忧外患之境。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病逝。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夺得汗位。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皇太极秉承其父遗志，西联游离于大明政权外之蒙古，东讨明朝藩属之朝鲜，完成满洲建国的内外部环境。明崇祯九年（1636），天聪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正式与明王朝形成相抗衡的政治势力。皇太极继承其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宣扬“以我为是，以明为非”的政治口号，动员满蒙各部参与对明王朝的战争。

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形成明、清之外的第三极政治势力。同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



乡野之民攻入北京城，问鼎紫禁城，大明王朝以亡国之君崇祯自缢煤山（今景山）而分崩离析。四月，多尔袞率满、蒙、汉八旗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一举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北京，转战河南、陕西一带。随后满洲人打出“为尔等君父报仇”的幌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山海关内，并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整个华北之境。六月，多尔袞迎顺治皇帝车驾迁都北京，正式“定鼎燕京”。十月初一日，年幼的顺治皇帝临御在皇极门（即太和门）颁诏天下，举行登极典礼，以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为“叔父摄政王”，统摄朝政。由此，这个由僻居东北一隅的满洲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成为中华统绪中最后一个王朝。此时，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是各地汉族地主武装，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明宗室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于是，统一全国、建立统一王朝成为满洲统治者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在多尔袞、多铎等人的筹划下，一场由北向南的统一战争徐徐拉开了帷幕。

顺治二年（1645），在八旗兵和绿营军精锐部队的进攻中，李自成部从陕西败退湖北，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被当地武装杀害。清军挥师南下，南明军队节节溃退，弘光政权岌岌可危。史可法坚守扬州屡次拒降，最终因孤城无援而被清军破城，史可法被害，清军大肆屠城，酿成“扬州十日”。得扬州城，南京城门户大开，清军在多铎的率领下未几便兵临南京城下，弘光帝朱由崧落荒而逃，守将将领、文武百官决计率众出城投降。毫无疑问，在统一战争中，多尔袞的功勋无可匹敌；在摄政过程中实行“参金酌汉”的战略，创建起各项政治制度。同时，多尔袞也逐步走向人生权力的巅峰，其封号由“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再到“皇父摄政王”。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位极人臣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袞享受君临天下的荣耀之时，却不料于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在塞北狩猎时病逝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境内）。

顺治八年（1651）正月，顺治皇帝福临亲政。接着，顺治皇帝开始了对多尔袞的一系列清算措施：收摄政王信符贮藏内库；褫夺摄政王母妻追封，撤庙享，掘墓鞭尸。戎马一生、功勋无数的多尔袞死后的境遇，让人不禁感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顺治皇帝亲政后，打出“以仁义定天下”的政治口号，革除多尔袞摄政时期圈地、投



充(强迫无地汉人投充到满洲贵族家下为奴)和逃人法等三大弊政。为缓和多尔袞摄政时期军事征服所带来的空前的民族矛盾,清廷采用汉大臣范文程等人“剿抚并用,抚重于剿”的战略,清军势如破竹,各地主武装、起义军纷纷瓦解,全国统一之图景渐渐明晰。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时年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突患天花崩逝于养心殿,遗诏以尚在幼冲之龄(八岁)的玄烨即帝位,以“勋旧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四大臣中以索尼为首辅,但自恃功高、专横跋扈的鳌拜不甘屈居于辅政大臣末位。最终,善工心计的鳌拜采用孤立、分化等手段最终夺得首辅地位。此时,原首辅大臣索尼病逝,苏克萨哈被鳌拜处以极刑,原有的四大臣辅政体制被破坏。鳌拜专擅大权,更加恣意妄为,结党营私,擅作威福。康熙八年(1669)五月,年轻的康熙皇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后,用计擒获鳌拜,王大臣等条列其三十大罪,“本应依议处死”,但最终念其功勋“不忍加诛”,改为革职、籍没、拘禁。清除鳌拜集团,康熙皇帝亲政,开启了国家一统和康雍乾盛世的历史大门。

然而此时摆在康熙皇帝面前的是“三藩”割据势力(即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台湾郑氏集团。清初分封三藩,原本为“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而由于藩王手握重兵,位尊权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对皇权构成巨大威胁。康熙十二年(1673),为巩固皇权,康熙皇帝力排众议,毅然实行“撤藩”之策。面对吴三桂等人的相继叛乱,在军事平反的同时,睿智的康熙皇帝运用分化瓦解、剿抚并用等策略,大量起用汉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之期,最终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平息,康熙皇帝又将重心放在台湾的统一上。清军平三藩之际,割据台湾的郑经趁机用兵闽粤,相继占领泉州、漳州、潮州等地,这让康熙皇帝感觉到了巨大的隐忧。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病死,郑氏集团内乱,次子郑克塽在冯锡范的助力下夺得继承权,是为延平王,奉南明正朔。康熙皇帝敏锐地感觉到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毅然力排众议,听取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以郑氏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军事统一台湾。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统



兵进攻澎湖，与郑氏集团守将刘国轩决战。澎湖失守，台湾门户大开，郑克塽、刘国轩再三思考，不得不选择上表请降。八月，施琅率大军进驻台湾。郑克塽等“纳土归诚”，康熙皇帝对他们施行宽容政策，封郑克塽公衔（海澄公），封刘国轩伯爵、授天津总兵官并在京师赐给宅地，封冯锡范伯爵衔。全部归入上三旗，拨给房屋、田地；命郑克塽家口、亲族及刘国轩、冯锡范家口迁移到京师，其他“伪官”及明宗室后裔朱桓等全部在附近各省安插垦荒。清廷统一台湾，开始设官职守（初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管理。

明末至顺治时期，俄国屡次派遣武装人员袭扰黑龙江流域。康熙四年（1665），一支俄国武装军队入侵黑龙江流域并建筑军事设施，是为雅克萨城，以此作为侵略东北的据点。面对俄国对中国东北部边疆黑龙江流域的侵扰与蚕食，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便已经注意到，但苦于无暇顾及。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皇帝东巡盛京（沈阳），开始着手准备部署应对俄国的入侵。二十二年，清廷与东北军民开启驱逐俄国武装的战斗。二十三年年初，除雅克萨之外，清军收复了黑龙江中下游的其余俄国军事据点。二十四年，在经过充分准备后，清军对雅克萨发起进攻，驱逐俄军并活捉俄军头目托尔布津，烧毁雅克萨城。二十五年，俄军重回雅克萨，清军再次出击，沙俄侵略军惨败，被迫要求和谈。最终经过谈判，中俄两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疆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中国领土。此外，康熙皇帝还亲征准噶尔蒙古，平定噶尔丹叛乱，稳固了清帝国的北部边疆，为雍乾时期平定西域打下基础。

政治上，甫一即皇帝位，年仅八岁的康熙皇帝就提出“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的执政愿景。亲政后，积极倡导“与民休息，道在不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治国理念。在经济上，兴修水利工程，解决泛滥、溃决问题。康熙初期，康熙皇帝将三藩、河政和漕运看作是治国三大事，其六下江南时，河政也是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之一；康熙皇帝秉持“藏富于民”的政治思想，施行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如奖励垦荒政策，其规定民人新垦荒地十年内免征赋税，此举极大刺激了民人垦荒的积极性，使耕种



面积迅速增加；如蠲免各地钱粮政策，凡遇有天灾等因造成歉收等情况，康熙皇帝多施恩蠲免钱粮。据统计，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凡蠲免天下各地钱粮四百五十余次，多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改革人丁税，实行“孳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等。

康熙皇帝晚年，政治上逐渐衰微，陷入朋党、皇子夺嫡的争斗之中无法自拔。在一场残酷的、历时十几年的所谓“九子夺嫡”中，最后皇四子胤禛以康熙皇帝遗诏“传位于皇四子”取得皇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是合法继位还是篡位，从其即位之初就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针对此，即位后雍正皇帝便展开了一系列打击政敌、巩固皇权的措施，网罗允禩、允糖集团罪状，幽禁允禩等皇子，整肃宗室，消除潜在威胁；削爵隆科多，赐死年羹尧。在政治上，雍正皇帝一改其父康熙皇帝晚年的“宽政”，实行严政，施行多项政治改革措施。雍正四年（1726），雍正皇帝采纳时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清廷在云贵原土司地区设置府、州、县，以流官管理，将其纳入帝国正常的政治治理格局中，加强了对云贵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七年（1729），在用兵西北时，雍正皇帝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在紫禁城隆宗门内设“军机房”，作为供其与军机大臣们一同商定军事战争事宜之场所。雍正十年，军机房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后来军机处成为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的机构，也成为内阁之外的又一个国家权力中心，延至清末一直存在（详见正文“军机处”相关内容）。另外，雍正皇帝还创建密建皇储制度，智慧地解决了皇位继承问题，成为后世遵行不变的祖制家法（详见正文“密建皇储”相关内容）。此外，雍正皇帝继承康熙皇帝遗志，继续用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数次用兵准噶尔蒙古，平定噶尔丹策零叛乱，解除帝国西北边疆危机。然而，雍正皇帝统治后期迷信道家仙丹养生之术，由于过量服用丹药中毒，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崩逝于圆明园，年仅五十八岁。按密建皇储之制，皇四子弘历即帝位，是为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雍正皇帝的“严政”，施行“宽严相济”的执政理念。乾隆皇帝十分仰慕皇祖康熙皇帝的治国理念，即位之初便打出“法祖”的政治口号。在经济上，继续实行奖励垦荒政策，

兴修水利，治理黄、淮河，兴修海塘工程；继续蠲免钱粮，还富于民；推广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奖励农业；继续用兵西北准噶尔、回疆，并成功统一天山南北。

乾隆时期“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楼文奋武”，执政凡六十年，征战四庭，其重大战争十次，故有“十全武功”之说。乾隆亲撰《十全记》以纪十功，曰：“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皇帝并以此“功绩”自诩为“十全老人”。乾隆所谓“十全武功”多为正义之举，为国家统一计，如平准、平大小和卓之乱（平回）、平大小金川之乱、平台湾林爽文变乱，两次出击廓尔喀入侵，而与缅甸、安南之战实有穷兵黩武之嫌。关于乾隆皇帝自诩所谓“十全武功”，清史专家孟森如此评价：“高宗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好大喜功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十大武功直接导致清朝政府“国帑告匮，元气夷伤，所谓‘功成万骨枯’欤”。

除“武功”之外，乾隆皇帝以“法祖”之名，大搞巡幸。其在位期间，凡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七次谒三陵、多次东巡盛京、热河。乾隆皇帝巡幸之数远超其祖父康熙皇帝，每次出巡各处，迎来送往，皆奢靡至极。

十八世纪中叶，随着困扰清朝康、雍、乾三朝长达八十余年的西部边境危机的结束，清帝国开始走向极盛期。然而随着天下承平日久，乾隆皇帝沉浸在其文治武功之中，开始秉持“持盈保泰”之治国理念，他曾在多处表达这一理念：“重熙累洽诚斯日，保泰持盈乃此时”，“遗孽廓清永砥属，持盈益励敬皇皇”，“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与中外臣民共之”。凡此等等，无不表达其“持盈保泰”之治国理念。这一理念的确定其实质上暗含着统治者积极进取之精神已逐渐消弭，贪图享受已经成为其最大的乐趣。

乾隆皇帝浸淫于“十全武功”，开始意骄志满，倦怠朝政。这给了宠臣和珅权倾朝野的绝好机会。乾隆后期，和珅集团几乎将朝中大部分与其敌对的势力消解掉，并竭力网罗扩大利益集团。和珅



大权在握，权倾一时，终成为清朝最大的“贪污之王”“贪官之王”，亦成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加之乾隆后期战争频仍，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平台湾林爽文变乱；五十二年平安南，五十三年、五十七年两平廓尔喀入侵西藏等，与此相随的是康熙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厚国帑日渐耗费，帝国财政出现潜在的危机。总之，十八世纪末盛世外衣掩盖下的清王朝已是陷入危机四伏之境。

乾嘉之际，是为清朝历史由极盛而衰的临界时期，延续一百余年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在乾隆皇帝晚年“持盈保泰”治国理念之下渐次走向历史困境。清帝国吏治日腐、民情日汹、国势日颓，衰象渐呈。嘉庆朝是清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期，上承“康乾盛世”，下启内忧外患的“道咸衰世”。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皇帝下诏于次年归政，传位十五子颙琰。次年“禅位大典”上颙琰即位，是为嘉庆皇帝。乾隆皇帝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太上皇”御政期。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驾崩。五日之后，韬光养晦长达数年之久的嘉庆皇帝降旨将和珅革职入狱、抄家，罢黜、囚禁和珅死党，开启了革新之路。“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嘉庆皇帝以积极的态度号召群臣参与“咸与维新”。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诏罢贡献，黜奢崇俭等成为此次维新的主题，嘉庆皇帝欲通过此达到“吏治永清，民生永静，藏富于民，国本自固”，力挽退败之势。嘉庆皇帝革新之谕一出，上自廷臣言官、乾隆旧朝清廉之臣，“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各抒己见，奏章凡涉吏治、军政等弊病，清弊之策等无所不备。一时间，朝廷中枢皆为股肱之臣，帝国朝政中枢政事呈现欣欣然之景象。然仅限于内政调整的“咸与维新”并没有实现嘉庆皇帝的政治愿景。

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等地爆发白莲教大起义。太上皇乾隆采取严厉镇压措施，“费帑不下千万，调兵不下十余万”，然愈演愈烈，遍及数省。嘉庆皇帝亲政后采取“教匪分治”策略，于嘉庆七年“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这应是嘉庆皇帝“咸与维新”最大成绩之一。按理来讲，嘉庆皇帝应该继续坚持其革新之举，然其走上了“守成”的治国之路。“守成”与“法祖”

成为嘉庆皇帝在短暂的“咸与维新”后的政治新选择，也因此成为清帝国由此而衰颓的内在原因所在。正是在此思想的影响之下，康雍乾盛世光环遮盖下的吏治、漕运、民生、八旗生计、盐政、财政亏空等种种问题并未能得以解决，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或严重化。“缔造维艰，守成匪易”，在嘉庆皇帝的循循善诱之下，道光皇帝亦继承了这种治国理念，并成为影响清帝国晚期政治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八世纪末的清帝国在盛世之后进入了停滞期，开始了由内而外的衰颓。其时的清朝皇帝和臣工们缺乏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与忧患意识，终日浸淫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当马嘎尔尼使团带着西方的工业品前来叩开天朝大门与西方通商贸易时，天朝臣工们将其当作是边远小国对天朝的朝觐，从而引发“磕头风波”的礼仪之争。乾隆皇帝与帝国臣工们竟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期与尔等互通有无”的傲慢自大拒绝了马嘎尔尼等人通商贸易之要求，随之中国也丧失了了解世界的机会。“守成”皇帝嘉庆竟也与其皇考极其一致的口吻拒绝了英国人通商贸易的请求：“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前来，徒烦跋涉”。

然而当天朝上国的皇帝和臣工们浸淫于盛世迷梦时，世界文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纪元——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开启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东方文明中依旧是传统的专制皇权，依旧保持着其内在的稳定性，渐次被甩在了历史发展之外。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守成”祖业二十五年的嘉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八月二十七日，赛冲阿等以嘉庆皇帝秘储朱谕拥皇次子旻宁即帝位，是为道光皇帝。早在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旻宁就以其在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变乱即“癸酉之变”中的神勇表现，获得了皇父嘉庆皇帝“有胆有识”“忠孝兼备”之盛赞和“有大能谦，不矜不伐，圣人之功，超迈前古”之考语。

道光皇帝在位凡三十年，躬耕勤政，凡蠲免钱粮、赈济灾民、



疏浚河道、改革财政、整顿吏治、整理盐政、改漕粮为海运、解决八旗生计、训练军事等，皆竭力加以矫治，欲力挽清帝国的颓势，然而面对行将就木的帝国，维护式的努力只能是徒劳。道光六年至八年（1826—1828），清军坚持“厚集兵力，一鼓扫除”的战略击败张格尔，收复西四城，于十二月生擒张格尔，献俘午门，平定张格尔叛乱。此举成为清帝国“嘉道中衰”时期最值得书写的一段荣耀历史。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道初时期，吸食鸦片在清帝国内已经泛滥，“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鸦片流入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与臣民身心健康，朝臣对鸦片之态度分为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和以许乃济为首的“弛禁派”，道光皇帝采取坚持禁止政策，钦差林则徐虎门销烟之举即是其严禁政策的明证。清帝国严禁鸦片与虎门销烟之举措，严重“侵害”到英国的商业利益。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皇帝在投降派的左右下，主张时战时合，终因军事实力不济而被迫求和，与英人订立近代历史上首个不平等之《南京条约》。英国人以船坚炮利叩开了清帝国的大门，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掀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篇章。

奕訢在清帝国内忧外患日趋加重之际即帝位，是为咸丰帝。咸丰帝即位之初，勤于政事，明诏求贤，“任贤擢才，洞观肆应”，先后罢道光权臣穆彰阿、耆英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吏治弊政、整理田赋盐政、兴修水利，力挽嘉道以来帝国之颓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帝国为支付战争赔款而重税赋盘剥农民，导致政治统治更加腐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加之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帝国百姓陷入生活绝境，“真有民不聊生之势”。有人形容当时之社会“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咸丰时期，历时十四年、波及十余省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本就处于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再度陷入艰巨。

咸丰一朝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并未能给奕訢成为像其祖辈们一样的盛世皇帝的机遇，自即位初便忙于应付太平天国民变和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疲于奔命在如此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



中，着实成了“苦命天子”。清帝国之政治、经济、社会更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然而，战争上的失败与屈辱条约让素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及颇有远见的帝国臣工们开始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由此而促成帝国最后的中兴——“同治中兴”。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因病驾崩于承德，六岁的皇长子载淳在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的辅佐之下即帝位，是年十月，慈禧不满八大臣专权，便联合东宫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或被诛杀，或被革职、遣戍，实行两宫“垂帘听政”，执掌清帝国大权，改年号为“同治”。自此后，清代历史基本上掌握在慈禧的手中，直至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病逝，统治长达近半个世纪。期间，虽有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建立起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然而由于创办者的封建性（“顽固派”），洋务只停留在器物变革的层面，并未触及阻碍国家发展的政治制度本身，这注定了其必然走向失败。洋务运动虽没有让中国走向富强，但其近代化的举措却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当然，洋务运动也让满洲贵族的统治延续了六十余年。

